

“跳出教育看教育”： 教育的公共服务属性及其理解^{*}

——基于国家治理场域

苏曦凌

内容提要 “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于国家治理的场域来理解教育的公共服务属性，为认识教育治理的规定性提供公共管理分析框架。文章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关系中，来确证教育的公共服务属性，并理解教育的基本品格和组织形态。“教育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权威政策话语，教育是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性公共领域，确证了教育的公共服务属性。教育具有服务性、公共性、专业性的基本品格，呈现为建制化存在并不断发展变化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从政治上看教育、从民生上抓教育、从规律上办教育，实际上就是在教育治理中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坚持和实现教育的品格，健全和完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建设教育强国、推动教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尤其要坚持审慎监管。

关键词 公共服务 国家治理场域 教育治理 审慎监管 新型举国体制

DOI:10.16091/j.cnki.cn32-1308/c.2024.06.001

问题提出：如何“跳出教育看教育”

教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① 2024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锚定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就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要“从政治上看教育、从民生上抓教育、从规律上办教育”。^② 之所以需要“跳出”，是因为教育并非一种孤立的存在，教育不是封闭地存在于某一教室或者学校。一切教育事实，不仅其本身是由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而且与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研究”（项目号：VAA230006）的阶段性成果。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 年，第 13 页。

② 高毅哲：《书写好以教育强国建设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2024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中国教育报》2024 年 1 月 12 日。

其他社会事实相联系,并由这一联系决定。之所以能够“跳出”,是因为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教育学邻近学科的方法工具,能够为探索教育现象的本质规律提供方法启迪。所以,“跳出教育看教育”的认识论本质,就是从教育存在场域的整体性和教育场域对教育本质的决定性来探索教育发展规律。

举国体制下的教育,“一切与教育有关的事务在某种程度上都应服从国家所施加的影响”,^①国家治理构成了教育赖以存在的场域。所以,“跳出教育看教育”首先必须从国家治理场域出发,“跳出”对教育的封闭和僵化理解,形成全景敞视,来“看”教育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系统构成和动态变迁。立足于国家治理场域来理解何为教育、教育何为,是一个关系教育治理研究是否得以合理展开的“元问题”。因为,如果仅仅关注“教育”的特殊性,而忽视“治理”的类本质,不从国家治理场域来现实地认识教育现象,不仅会使得对“教育治理”的理解降格为对“教育管理”方法的技术性升级,更会弱化研究成果的解释力。立足于国家治理场域,本文试图在确证教育之公共服务属性的形式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基础上,展现教育公共服务的基本品格,进而从静态与动态两个维度来分析教育公共服务的组织形态,从而为“跳出教育看教育”,理性认识教育治理的基本逻辑提供公共管理分析视角。

存在理据:确证教育之公共服务属性的形式逻辑和实践逻辑

通过中国知网(CNKI)“中国政报公报期刊文献总库”检索,我国国家层面关于“教育公共服务”的官方表述,最早出现于《国家计委、教育部、财政部印发关于“十五”期间加强“211工程”项目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计社会[2002]1505号)中,该文件明确提出要“使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运行环境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的逐渐深入,人们对公共服务的本质认识不断深化,“教育公共服务”这一语词在政府官方文件中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截至2024年2月,该数据库含有“教育公共服务”这一表述的政府文件,已经达到79639件,由“高等教育公共服务”拓展到“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家庭教育公共服务”“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

“教育公共服务”的官方表达从形式逻辑上确证了教育得以成为一种公共服务的理据。从语言的形式规则上来看,“教育公共服务”这一表达,是对“教育”与“公共服务”之间种属关系的官方确认。即,“教育”是“公共服务”的一个类别,“公共服务”是“教育”的种类属性。然而,要科学地认识教育这一复杂现象、深刻把握教育与公共服务的内在关系,仅仅依赖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则是不够的,还必须立足现实,从国家治理场域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来为教育的公共服务属性寻找实践中的“合法性”证明。

从国家层面来看,教育是国家的职能。作为国家职能的教育,其根本任务就是推动政治社会化、社会知识化。例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作为国家事业的教育之根本任务。即,“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

^① 埃米尔·涂尔干:《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载张人杰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①一方面,从政治社会化来看,教育是国家意识形态不断获得强化、认同和铸牢的基本路径。所以,《共同纲领》强调新中国的教育必须“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强化国家认同,在思想观念上将社会成员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另一方面,从社会知识化来看,国家繁荣昌盛、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美好的背后,无不蕴藏着科技立国、教育立国的基本逻辑,须臾不能脱离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强基赋能。可以说,推动政治社会化和社会知识化,构成了国家承担公办教育所有者职能、教育事业管理者职能的行动起点。

教育是文化的传递。“所谓教育,说到底是一种文化传递活动”,并结成“文化传递结构”。^②这样的一种“文化传递结构”,并不能脱离其他社会关系而孤立存在。更进一步说,教育社会关系由社会所决定,受经济、文化等社会关系所制约。当然,强调教育社会关系由社会所决定,并不是一种机械决定论,而是一种能动决定论。因为,受到社会所制约的“文化传递结构”,塑造了能动的社会主体——人的社会化,因而会对社会变迁与发展产生能动影响。总之,作为社会能动决定的“文化传递结构”,教育社会关系既有着社会制约性,又有着自身的自主性。

作为国家职能履行的教育与作为社会文化传递的教育,是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国家为了推动政治社会化、社会知识化,不能脱离社会文化传递的现实需求、条件机制和育人规律,因而教育的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社会的主体性。另一方面,稳定、持续的文化传递关系的达成,仅仅依靠社会自发进化难以实现,必须依靠国家的理性建构,国家构成了教育发展的主导性力量。这是因为,“文化传递”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仅仅依靠传递者与接收者双方的契约,难以形成有效的与外部效应相匹配的内部产权,从而引致了社会端的集体行动困境。而且,“文化传递”关系要结构化,定型为模式化的“文化传递结构”——教育制度法规,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的理性规划和集体选择。

国家职能履行和社会文化传递的共生实践逻辑,决定了教育的公共服务品格。一方面,建立推动国家教育职能履行的教育制度、政策,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强化这些社会条件,又需要建构相应的教育制度和政策。所以,教育既是国家夯实其社会基础的手段,也是社会维持和发展其共同体本质的中介,具有公益性、集体性、秩序性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特征。

首先,教育具有公益性。教育的目的是增进公共利益,而不是谋取私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8条明确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其次,教育具有集体性。教育的存在和发展,需要集合公众力量,不是一项纯粹的个人事务。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自不待言,即使是极度个人化的家庭教育,也不能脱离公众力量而展开。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需要立法,并明确提出“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最后,教育具有秩序性。集体性、公益性的教育事业,必须通过国家法律、法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江西政报》1949年第3期。

^② 吴康宁:《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0页。

规、政策予以规制。无论宏观上的教育内容设定、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方式选择,还是微观上的教材、教法、教师,均处于规制之中,具有明显的秩序性特征。

基本品格:教育之公共服务属性的具体展现

确证教育的公共服务属性,不仅是对“何为教育”的理性应答,而且内含了对“教育何为”的理解和诠释。作为公共服务的教育,在功能、主体、知识三个方面,呈现出服务性、公共性、专业性的基本品格。

(一)功能品格:教育的服务性

从功能上来看,服务性是教育公共服务的基本品格。教育的目的是为学习服务、为人身心素质发展服务,从而推动政治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服务于国家社会需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的“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规范性地涵盖了教育功能的服务性品格。教育公共服务功能上的服务性品格,要求将服务性严格界定在教育公共服务的功能产出层面,而不能泛化到教育场域的各种结构关系。“为学习服务”,不是对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互动方式的规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前在知识储备存在着明显差别。所以,教育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地位相结合,才能够更好地“为学习服务”。在这里,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并不是对学生作为学习活动主体地位的否定。教与学是一个完整教育过程的一体两面,教师与学生都是教育过程的主体性存在。教师主导是以服务于学生学习需要为中心的主导,学生主体是教师教育引导之下的主体性成长。

(二)主体品格:教育的公共性

就供给主体而言,公共性是教育公共服务的重要品格特征。任何教育,无论是现代的教育还是传统的教育,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公共性品格。公共性是教育公共服务的内在规定性。在不同的教育样态之间,只存在公共性的强弱之分,而不存在公共性的有无之别。“公共性的本质是共同体协作”,^①教育公共性的实质是教育共同体协作。所谓“教育公共性”,就是指基于共同利益,政府、企业、学校、家庭等多元主体,主导、介入、参与教育,结成教育公共服务生产与再生产中的协同合作共同体。教育公共服务的公共性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就需求侧而言,教育公共性源自政治社会共同体延续和发展的内在需求。只有通过教育有力强化公民的认同意识,共同体才能不断铸牢内部成员之间实现紧密联结的精神基础。而且,只有通过教育赋能个体成长,使个体具备在各领域发挥作用的能力与素质,共同体才能实现有效的社会分工和代际传承。共同的需求使所有共同体成员期待的教育目标是内容公允、机会公平、方式公正。这发展为教育的内在伦理准则,而且依据这一伦理准则而产生的教育评价,逐渐发展为一种关于教育之理想愿景和实然状态的公共意志。

就供给侧而言,教育公共性生成于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协作生产。多元主体的协作生产是

^① 罗梁波:《公共性的本质:共同体协作》,《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

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在结构上,协作生产体现为多元主体之间的教育治理体系。从政府内部协作来看,教育行政体系依托分级管理、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管理机制,确立了上下级、纵横向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协作关系。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作来看,教育治理体系体现为政府主导、学校主体、社会协同。在功能上,协作生产体现为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家庭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分化与耦合关系。

教育公共性的彰显,是教育共同体协作生产程度提升的实践过程。从需求侧管理来看,社会个体的教育公共服务需求,是具体而且多样的。教育共同体需要通过公正的资源分配机制、规范的秩序规制机制、有效的激励诱导机制、合理的疏导调节机制,在长远与急需、重点与兼顾、整体与局部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来满足社会的多样教育需求。从供给侧改革来看,教育共同体需要建立灵敏的回应机制来适应多元教育需求,要不断强化各供给主体、各供给流程之间的协同关系。正是在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的双向发力、协同作用下,教育公共性才得以不断生成,成为教育公共服务的主体品格。

(三)知识品格:教育的专业性

专业性的教育知识,构成了教育事业延续发展的知识基础。从语义上来看,专业(profession)不同于职业(occupation),其意蕴为一种专门的技能和知识。教育的专业性,是指教育建立在专业化的知识基础之上,从而与其他公共服务门类区分开来,在知识上发展、体现和实现自身的独特性。教育专业知识,是关于为什么教、教什么、如何教等育人规律之认识、方法和技术的总称。它生成于教育实践,经由教育实践检验、完善,并经由传播、对话和认同,发展为教研共同体的共识性认知。

就知识品质而言,教育知识具有鲜明的公共物品特征。一方面,“知识”不同于“意见”,^①教育知识具有非竞争性。“意见”是个人化、群体化的认识。某个人或群体对某种“意见”的言说和使用,实质上是与其他个人或群体“意见”的竞争。教育知识是教研共同体的共识性认知。对某一教育知识的运用,不仅不会弱化其他教育知识的效力,而且会拓展教育知识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专业”不同于“专有”,教育知识具有非排他性。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知识传递,不仅传授了教育者聚焦的技术性知识,而且示范了教育者的传授思路、技能等方面的实践性知识。受教育者对这些实践性教育知识的感知、评价、内化,实现了教育知识的外溢,弱化了对教研共同体以外人员的排他性。

“从规律上办教育”,按照教育的特点来发展教育公共服务,尤其要尊重、保障教育知识的专业性。一方面,教育知识生成于教育实践并在各种教学展示、研讨中获得传播、内化和认同。所以,在教研共同体开展系统的理论学习是必要的,但理论的学习不能停留在灌输和说教层面,而是要注重互动沟通的深度和效度,增强主体间理性协商,基于实践、围绕理论来相互印证各种理论和观点。另一方面,要尊重教研共同体人员归纳出的符合教育规律的知识法则。

组织形态:发展中的现代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现代教育公共服务是一种建制化的组织存在。建制化存在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又会受

^① 陈嘉明:《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到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影响,处于不断的发展流变之中。

(一)静态结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现代教育公共服务,是由基本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构成的有机系统。按照《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为了实现基本的“学有所教”需求而提供的义务教育服务和学前教育、普通高中、中等职业等领域的“助学服务”。教育非基本公共服务,是指为满足公民义务教育阶段以上更高层次教育需求、保障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所必需,但社会自发供给不足的学前教育服务、高等教育服务、老年教育服务等。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与教育非基本公共服务都具有普惠性,但需求层次、筹资方式大相径庭,政府在其中具有不同的责任强度和履责方式。对于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政府在其中负有兜底性的保障责任。对于教育非基本公共服务,政府主要通过支持政策来增加供给,实现大多数公民以可承受价格付费享有。

现代教育公共服务,是国家理性力量形塑而成的体制化系统。首先是建构组织。国家会按照层级节制和属地管理原则,设置不同层级和地域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配置相应的公共服务载体和资源,实现教育公共服务管理和供给的“条块结合”。其次是嵌入秩序,将自身所期望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协同机制及其秩序规则,由外而内地嫁接,使它们转化为教育公共服务系统的运转规则。最后是吸纳力量。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将原来处于游离状态的教育资源和力量,纳入国家主导、社会协同的教育公共服务生产过程,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合作生产。

体系化的教育公共服务,在形态上表现为以理性化科层制为结构方式而存在着的教育组织系统。主要的教育主体——教师,在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是职业化的存在,或者是“为”教育而生活,或者是“靠”教育而生活。教师的任职资格、晋升标准、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效果必须遵循该体系所订立的刚性标准。受教育者总是需要在体系的不同层级、类别的学校、课堂、课程,来获得教育公共服务产品,展开多姿多彩的教育生活图景。

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具有复杂性特征。首先是环境复杂性。教育公共服务体系面对的问题环境,往往不是单一的教育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且,教育服务体系所处的运行环境,又会深受国家制度环境、地方政策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次是主体复杂性。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涉及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等。不仅包括专门履行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关,也包括通过履行自身职能而产出教育公共服务产品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不仅包括学校,也包括补充学校教育不足的其他教育机构;不仅包括教育组织,也包括通过个人影响而发挥教育作用的公民。最后是产出复杂性。不同教育阶段的公共服务产出,往往具有关联性,将不同教育阶段的问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使得教育问题始终贯穿于人的社会化过程。

(二)动态流变:发展中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是一个生成并不断适应国家治理场域的动态过程。体现在功能上,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是以提供更多数量、更高教育质量的服务产品来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的过程,不断彰显其服务性。体现在主体上,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是公共性不断彰显,多元教育公共服务主体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体现在知识上,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是专业性不断强化,教育共识逐渐在共同体生产、传播、普及、认同的过程。服务功能的提升、公共性

的彰显、专业性的强化,都是国家与社会互补、互塑的产物。可以说,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国家与社会在教育场域的良性互动。

在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国家与社会并非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而是良性互动的协同关系。作为主导性力量,国家和政府通过广泛分布的教育公共服务载体,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将自身对于社会教育需求的管理和回应延伸到社会,进一步强化了自身在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配置资源的地位。社会组织、企业 and 家庭等方面的社会力量通过广泛分布的各级各类服务载体,在消费教育公共服务产品的同时,将教育公共服务需求信息传导到国家主导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从而介入了公共服务的再生产过程,在教育公共服务的消费和生产中体现、实现着自身的主体性。

历史地看,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情势不同,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运行方式与基本产出存在着不同的阶段性特征。首先,在不同历史阶段,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不同,国家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所面对的各方面社会需求,如教育需求、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等等,存在着轻重缓急的明显差别,因而教育在国家治理职能结构中的定位会有所不同。其次,在不同历史阶段,社会资本拓展、社会组织发育、社会意识进化亦存在着明显区别,因而社会对于教育的需求、对于教育合作生产的承载能力也会存在着明显差别。最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也会存在着明显差别,从而导致国家管理教育的手段、社会发展教育的途径、国家与社会合作生产教育的工具组合存在明显差别。

认识到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的历史性,有助于客观认识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以来教育的发展。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超越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情势,去看待“教育同质化”“教育不公平”^①等问题,是一种静态而抽象的、刻舟求剑式的教育认知。教育公共服务的多样化发展,必须建立在教育公共服务标准化基础之上。脱离标准化谈多样性,甚至将标准化建设作为“同质化”的原因,是一种空洞的“多样性”,使得教育多样化发展失去现实依据。同样的,教育公平是历史的现实,是一个在教育历史中发展和实现的价值。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一穷二白”的困境,实现教育公平的首要任务,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②提供尽可能多的基本教育公共服务产品,构筑公民受教育权得以实现的现实条件。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进一步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不仅要注重扩大高质量教育产品的供给,形成基本教育公共服务与非基本教育公共服务联动发展局面,而且要更加注重“教育资源配置向弱势群体和困难地区倾斜,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③

结论与讨论:推动教育发展的国家治理逻辑

“跳出教育看教育”,需要立足国家治理的场域,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确证和把握教育的公共服务属性,理解教育的应然品格和实践样态。教育作为一项公共服务,不仅已经成

① 刘争先:《国家建构视域下的教育失败与教育治理》,《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江西政报》1949年第3期。

③ 中共教育部党组:《扎实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光明日报》2021年6月9日。

为权威的政策话语表达,具有语言上的形式逻辑依据,而且属于国家与社会重叠性公共领域,国家职能履行和社会文化传递的共生实践逻辑,决定了教育的公共服务品格。作为一项公共服务,教育在功能、主体、知识三个方面,具有服务性、公共性、专业性的应然品格。这些品格在实践中的彰显,既是教育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提升教育在国家治理场域适应能力的必然要求。

确证和理解教育的公共服务属性,提供了一个揭示何为教育治理、教育治理何为的公共管理分析框架。教育治理是政治社会共同体以服务性、公共性、专业性为实践原则,以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为组织基础,对教育公共服务所实施的治理活动。教育治理的基本路径是实现国家与社会在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结构-功能的分化与耦合,在国家建构与社会进化、政治势能与社会动能的良性互动中推进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发展。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更加向往,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保障水平成为影响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因素。面对人口结构持续变迁、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我国教育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在新型举国体制之下发展教育,按照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原则来实施教育治理,尤其要依据审慎监管的思路,在激发社会活力、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的同时,保障教育公共服务的服务性、公共性、专业性。在当前,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目标,对教育审慎监管至少应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按照管办评分离、放管服结合的方式,在提高学校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约束能力的基础上,给学校松绑减负,保护、释放学校办学活力。其次,依法监管校外培训机构。在加快解决相关法律法规供给不足问题的基础上,坚决杜绝运动式监管,避免监管部门运用自身的裁量权抬高准入门槛。最后,将政府的“有形之手”、市场的“无形之手”、社会组织的“志愿之手”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作者简介:苏曦凌,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桂林,541004

〔责任编辑:王 婷〕

Based on a single case analysis of the “Five Entries” work of safety propaganda in County A, this paper proposes an “efficient execution” analysis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he effective execution of unconventional tasks by the delib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context driven mechanism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efficient execution,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policy goals and execution capabilities forces the deliberative and coordinating bodies to produce the beginning of efficient execution. The leadership triggering mechanism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efficient execution, which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legitimacy and legitimacy by capturing the scarce attention resources and authoritative support of leaders. The organizational adjustment mechanism is the key to efficient execution. Through the adaptive adjust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t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an execution ecology with clear responsibilities, clear tasks, and resource aggregation.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centive co prosperity mechanism is to ensure the long-term promotion and performance production of unconventional tasks through sustained positive incentives and flexible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The potential innovation of the paper lies in introducing efficient execution issues of unconventional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revealing a vivid picture and micro mechanism of effective execution of unconventional tasks by deliberative and coordinating institutions,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expanding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research boundarie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4. “Jumping out of Education and Looking at Education”: The Public Service Attribute of Education and Its Understanding: Based on the Field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u Xiling · 86 ·

Jumping out of education and looking at education, based on the field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o understand the public service attributes of education, provides a public management analysis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gulatory nature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Based solely on the social attributes of edu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from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the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is biased. The article aims to verify the public service attributes of education and understand the basic character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of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ual un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Education public service” has become an authoritative policy discourse. Education is an overlapping public domain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which confirms the public service attribute of education. Education has the basic qualities of service-oriented, public, and professional, presenting as an institutionalized and constantly evolving education public service system. Fro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focusing on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conducting education according to laws, it is actually to achieve a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dhere to and realize the character of education, and improve and perfect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of education. We should Build a strong education country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public services, especially adhere to prudent supervision.

5. The Predicament of the Silver-Haired: An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Labor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Young Old in a City

Liu Jie · 119 ·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focus on aging practice of the young old. The public property of the young old manifests in family labor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which can not be interpreted by activity theory or separation theory alone. The attitude of young elderly to family labor mixes understanding